

寻求“第三条道路”

现代社会民主党思想发展史



東方出版社

寻求“第三条道路”

现代社会民主党思想发展史

〔苏〕C·C·萨雷切夫著

李兴汉 潘德礼 周士瑞 崔建设译

東方出版社

С. С. САЛЫЧЕВ

В ПОИСКАХ

„ТРЕТЬЕГО ПУТИ“

Эволюция идеологии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ую эпоху

根据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88年版译出

寻求“第三条道路”

XUNQIU DISANTIAO DAOLU

——现代社会民主党思想发展史

著者/[苏]С·С·萨雷切夫

译者/李兴汉 潘德礼 周士瑞 崔建设

封面设计/郭振华

发行/新华书店

印刷/世界知识印刷厂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3.75 字数/281,000

版次/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233-7/D·4 定价 5.20元

（内部发行）

出 版 说 明

为了供党、政、军领导机关及有关人员了解研究社会民主党思想及其主要理论的演变，我们组织编译了这本书。内容包括苏联著名历史学博士、国际共运史专家С·С·萨雷切夫的《寻求“第三条道路”——现代社会民主党思想发展史》全文及苏联近年来发表的五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它们集中反映苏联在社会民主党问题上态度的变化，反映苏联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在一些重要理论及政策问题上的异同。

如公开引用，请注明原出处。

1991年1月

序 言

历史学博士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萨雷切夫教授（1928—1983）的名字蜚声我国和国外社会学界。

有关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和一般民主斗争史的基本问题的大量研究著作是出自他的手笔。С·С·萨雷切夫为编纂八卷本巨著《国际工人运动——历史和理论问题》作出了有份量的贡献，他作为总编辑委员会的成员、第五卷的责任编辑、一些章节的作者参加了该著作的创作工作。出版了许多经他编辑和参与撰写的有关揭示我们时代进步社会力量斗争、资本主义总危机史的社会方面和思想政治方面的集体学术专著。

然而，这位学者的遗产中占有主要地位的是专门论述国际工人运动中改良派历史的著作^①。对他来说深入而全面地钻研这个问题并非是其目的本身，而是从属于解决一些迫切

① 参见С·С·萨雷切夫：《法国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1944—1964年）》莫斯科1966年版；《社会民主党的过去和现在》莫斯科1968年版；《现阶段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革命斗争问题》莫斯科1971年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国社会党（1921—1940年）》莫斯科1973年版；《社会民主党：思想政治演变与为工人阶级的团结而斗争问题》莫斯科1974年版；《当代世界的社会民主党》莫斯科1982年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社会改良主义意识形态的中间方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莫斯科1984年版。

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主观因素、人的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揭示革命与改良之间的相互关系，参与阶级斗争的各种不同社会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作者绝不是以哲学直观观点，而是从历史理论的观点出发来研究这个综合性问题的，其基础乃是具体地研究活生生的、发展中的首先是西欧，特别是法国的资本主义现实，因为法国阶级冲突非常尖锐，工人运动具有战斗传统，拥有共产党人同社会党人在不同时期合作的丰富经验。从这一角度出发，作者能够更充分地研究国际工人运动中两股基本力量相互关系的历史发展趋势，更深入地评价它们进行合作的现实可能性和前景。

值得读者注意的这本书，乃是作者就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命运及其在当代世界上的作用问题进行多年勤奋研究和思考的成果。

C·C·萨雷切夫的著作充满论战的火药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研究课题本身的选择所决定的。这实质上是一场围绕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观点截然相反的那些问题所进行的思想理论论战。这既反映在本书的基调上，也反映在对具有原则意义的各种论点的阐述当中。

社会民主党乃是国际舞台上的一支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它在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斗争中占有重要地位。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确认了我们党发展同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联系的路线，其出发点是同它们的合作首先在防止核战争方面会起很大的作用。

同时，众所周知，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存在着

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特别是在对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民主的实质的认识方面。苏共捍卫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理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运动的任何影响，反对改良主义。当然，意识形态分歧不应该妨碍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采取共同的或并行不悖的行动，这指的是维护和平、巩固国际安全。

本著作乃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专著，它的着眼点集中在一些经过严格确定的问题上，它的宗旨是沿着一个很长的历史轨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80年代初——分阶段地、批判地分析国际社会民主党最有代表性的领袖人物的理论构想，展现国际社会民主党思想政治演变的基本倾向。

这位学者具有非凡的渊博学识，他得心应手地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如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文件、社会党国际文件、主要社会民主党的文件、社会民主运动著名活动家们的著作，以及苏联和国外的大量学术文献，这使他得以创作出有意义的、重要的著作。具体的事实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排挤开作者的基本思想，相反，它们成为必要的原始资料，由此而结晶出一整套合乎逻辑的论断。作者不是孤立地看待某些首领和政党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具体问题上的立场，而把它们看作是反映整个社会民主党发展中的某些方面的特有现象。

全面地再现70年来社会民主党的思想政治演变过程，以及具体地分析主要是几个最大的政党在不同时期的理论和实践，自然而然地使对社会民主党其他重要方面的研究退居到了次要的地位或者留在了本书的范围之外。在这里，作者本人的总构想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并不奢望全面地概括加入社

会党国际的数十个工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当前从事活动的各种不同条件。例如，关于社会民主党对群众，首先是对工人阶级产生广泛影响的根源问题，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演变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意识的特点、与整个社会演进之间的联系问题，论述时显得过于惜墨。在许多场合，只是十分简要地介绍了局势、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的政策和共产党的政策的特点，这也是必然的。

作者在他以前的一些著作中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中的某些问题进行过研究，此外，这些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苏联其他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对象。例如，在И·М·克里沃古兹的著作《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23—1940年）》（1979年版）中就在很大程度上注意到了改良主义对不同劳动者阶层的影响问题。在《共产党人与当代社会民主党》（1975年版）这部集体著作中阐述了改良主义者在工会运动中的活动，他们对欧洲安全问题、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科学技术革命的态度。

谈到专门论述社会民主党思想政治发展的著作，在这里应该特别注意一些专门的研究著作：С·С·萨雷切夫参与撰写的集体学术专著《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1984年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1980年版），《改良主义中的分化与发展（批判地分析西欧社会民主党中的左翼派别）》（1983年版），H·Г·西比列夫的专著《社会党国际：历史、意识形态、政策》（1980年版）。在А·Б·韦贝尔、А·А·加尔金、С·С·格里巴诺夫、В·В·扎格拉金、Ю·Л·莫尔恰诺夫、М·А·奈马克、С·П·佩

列古多夫、С·N·波波夫、Г·С·索戈莫尼扬、В·А·乌瓦罗夫、N·H·温达瑟诺夫、А·С·切尔尼亚耶夫、K·Г·霍洛多夫斯基以及其他苏联学者的著作里也详细研究了这一课题的不同方面。

С·С·萨雷切夫的学术专著乃是一部研究几乎整个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社会民主党思想政治演变的总体性著作，其中贯穿着作者具有深刻创造性的、在很多方面有独特见解的观点。本著作带有研究者个性的明显印迹：他出类拔萃的天赋、他特有的吸引力，使读者从开头几篇起就被吸引住，不得不兴致勃勃地追随作者思想的发展。

甚至对那些在许多著作中司空见惯的内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第二国际的破产、在法西斯主义面前社会民主党的软弱无力——也都论述得新颖而有趣。作者还坚定而有独创性地观察苏联文献中研究较少的那些问题，例如，对M·阿德勒、O·鲍威尔、L·布吕姆的观点的评价问题。他对社会民主党利用P·达连多尔夫关于调节社会冲突的构想这一比较新的现象进行了分析，从这个分析中，以及在这部有独到见解的研究著作的其他许多地方都可以感觉到作者的思维具有相当的深度，是出类拔萃的。

同时，作为学术创作中的常事，作者就某些具体问题提出的观点是有争议的，可能有必要用新的事实来进一步确切化和论证，或者说，在展开论战时，作者对个别现象的评价看来是片面的、不够均衡，对此读者应该有所准备。不是所有从事社会民主党问题研究工作的苏联研究人员都同意例如作者对有关现阶段社会民主党思想政治演变总评价方面所作

出的某些过于绝对的结论。

可惜，学者的早逝使他无法完成手稿的加工工作，无疑，在准备出版的情况下他本来是会对手稿进行修改的。然而，他提出的见解有助于深入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展开创造性的讨论，拟定出进一步研究这一现实课题的有成效的途径。

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作者作出了不少准确的评语和判断，这是对苏联学术文献的宝贵贡献。

C·C·萨雷切夫的这本书不仅面向专家，而且也面向所有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现实、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感兴趣的人。

谨此对C·A·米高扬、B·H·米罗诺夫、T·A·萨雷切娃、A·П·谢苗诺夫、E·И·亚罗波诺夫，以及П·M·布哈尔梅多娃、H·C·伊万诺夫、M·Б·科尔恰金娜、П·A·莫罗佐娃表示感谢，他们每一位都以自己的方式十分认真而富有成效地参加了C·C·萨雷切夫手稿的整理出版工作。

历史学博士

Ю·H·阿法纳西耶夫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分裂的开端	(1)
第二章 向右转	(45)
第三章 面对法西斯主义	(82)
第四章 战争的考验	(132)
第五章 社会党国际的建立	(166)
第六章 盛衰荣枯的“第三条道路”	(206)
第七章 现代世界的社会民主党	(268)

附 录:

改革和社会民主党的理论观点	(338)
社会民主党与当代世界	(349)
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 历史与现实	(369)
苏共与社会民主党: 相互关系的新方面	(400)
社会民主党人: 渊源与目标	(418)

第一章

分裂的开端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赋予工人运动最伟大历史责任之后，使工人党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战争一开始，对群众施加政治和思想影响的所有工具就都开动起来，其目的在于用沙文主义的烟雾掩盖阶级对抗的现实，扼杀阶级斗争，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交战国的统治集团利用战争作借口策动对工人组织和民主主义组织的残酷镇压。大多数社会党首领借口工人运动被迫在不利的条件下战斗，而拒绝执行第二国际关于必须进行革命斗争来反对战争的决议，而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政策。结果，第二国际停止了活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分裂为不同的民族的队伍。

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文献执意否认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破产之间的联系，否认第二国际的右翼领导人对工人运动的分裂负有的责任。

社会民主党中派权威思想家K·考茨基断言，工人运动的分裂是由世界大战造成的客观状况所引起的，而绝不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的行动所引起的。他写道：“世界大战正在把社会主义者分裂成不同的阵营，主要是分裂为不同

的民族阵营。国际没有能力去阻止这种事。这就是说，国际在战争中不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国际主要是和平的工具。”^①

在考茨基看来，第二国际的反战决议是不现实的，因为战争初期笼罩在群众头上的沙文主义狂热排除了坚持反战立场的可能性。他确信如果有哪个人有“超人的勇气”抗拒群众的狂热，那么不是政府，而“正是狂怒的群众会将他就地处决。”^②

直到现在在社会民主党的文献中仍然断言，似乎第二国际的首领们除了追随着受沙文主义狂热所驱使的工人群众之外别无出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J·布劳恩塔尔写道：“各社会主义政党在思想上和政治立场上发生的这一戏剧性大转变，是无法用它们的领袖‘背叛’来解释的……再说，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千百万人独立进行的群众运动，并非屈从于领袖的强制。领袖们得到群众的信任，是因为他们代表群众的意愿说话，是因为他们在指导运动中符合群众的要求，同群众息息相关。”^③

由此得出结论，据说，机会主义领导人转到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这不是背叛，而是真正相信工人阶级……的表现（?!）。社会民主党史研究者之一L·米塞写道：“似乎那些赞成军事预算的社会主义领袖们（在德国——作者注）背叛了群众，这种论断是荒谬的。群众万众一心地赞成凯撒的战

① K·考茨基：《国际主义和战争》柏林1915年版第38页。

② 同上，第345—346页。

③ J·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争……”^①

当时，R·卢森堡在对这类议论进行评论时，讥讽道：“《共产党宣言》的全世界历史性号召被大大地增补了，而经考茨基修改后应该这样来读它：‘全世界无产者在和平时联合起来，在战争时期彼此厮杀’。”^②社会沙文主义者们的这种拙劣立场是用任何诡辩也无法掩饰的。

毫无疑问，要与开始普及到相当广大群众中间的伪爱国主义狂热相对抗，需要有相当大的政治道德勇气。要知道，社会民主党在采取反战立场的情况下同时面临着遭受残酷镇压的危险。例如，在法国，警察当局搞了个所谓“B号名单”，在这个名单中记下了要在战时加以隔离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和工会的积极分子。在其他国家里，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但是，以这种困难为借口，试图证明似乎在当时情况下社会沙文主义领袖们的行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表现，是最符合劳动者的利益的，这种做法是站不住脚的。社会民主党文献中称之为政治现实主义的那种东西，实际上是机会主义、改良主义阶级合作政策在战争条件下的继续。根据列宁准确的定义，“社会沙文主义是机会主义在1914—1915年的战争环境中的产物。”^③英国工党著名理论家G·科尔事实上也承认机会主义与社会沙文主义有联系，他写道：“毫无疑问，如果1914年欧洲各国的工人阶级是处在积极准备革命或革命社

① L·米塞：《全权政府》巴黎1947年版第243页。

② 《国际》（慕尼黑）1915年4月号第8页。由R·卢森堡和F·梅林创办的这份杂志只出了唯一的一期。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648页。

会主义的直接影响下的状态中，那么情况就会是另一种样子。”^①

就这个意义上说，考茨基关于第二国际在战争条件下无能为力的言论乃是一种自我暴露。实质上，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反战决议绝不反映欧洲社会民主党多数领袖的政治实践。考茨基推说，似乎怕与暂时为沙文主义狂热所驱使的群众情绪发生对抗，是社会民主党首领们战时行为的主要原因，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问题在于，在战争开始前，还根本谈不上社会沙文主义狂热的压力，机会主义的工人领袖们就已经开始准备与资产阶级政府合作了。例如，1914年7月25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发表了反战呼吁书，该呼吁书在结尾处写下这样的字句：“打倒战争！各国人民兄弟般的国际团结万岁！”^②也就是在这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首领秘密向政府保证，他的党的领导者们将赞成军事预算。由于有了这种保证，帝国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1914年7月30日在内阁会议上宣布，社会民主党人是“忠顺的”，在战时根本谈不上抗议罢工。^③1914年8月2日，社会民主党各“自由”工会主席团代表会议决定停止一切罢工。同时，与企业主组织就自动延长工资合同和停止罢工达成了协议。^④在法国，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书记迪布勒伊在1914年8月2日举行的集会

① G·科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4卷：《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1914—1931年）》伦敦1958年版第29页。

② 《前进报》1914年7月25日。

③ 《德国革命史图片集》柏林1929年版第96页。

④ P·乌姆布莱特：《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工会》柏林1917年版第20—21页。

上宣称：“我们的职责是捍卫爱好和平的共和制的法国的完整和独立。”^①

因此，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在战争开始的最初一刻，各国帝国主义政府就得知许多社会民主党首领都准备支持战争，这只会鼓励战争的拥护者。

伪爱国主义情绪的一时冲动帮助遮掩了社会沙文主义首领们行为的真实意图，但这不是他们行为的主要原因。

没有任何根据断言，似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政策在当时情况下是符合每个国家劳动者的利益的。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在工人阶级的各民族队伍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间造成矛盾，相反，却展示了它们的牢固的统一。各主要交战国所追求的不是民族的目的，而是特殊的帝国主义目的。至于说到国内政治方面，那么每个国家的统治集团都把自己扼杀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计划与战争联系起来。

当局利用战时法律限制或取消民主权利和自由，残酷镇压工人的反抗，对革命分子进行彻头彻尾的陷害，诬蔑他们是敌人的帮凶。对有革命情绪的工人进行大规模镇压、解雇和鼓动他们上前线，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常事。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都以战时需要为借口来为阉割民主的政策辩解，但是，事实上，对民主的进攻是由更深层的阶级目的所驱使的。例如，德国企业主联合会公然表示希望：“……战争这个严酷的学校为我们提供反对我们国家制度进一步民主化的强有力

^① 《人道报》1914年8月3日。

的论据，而且只能提供这种论据……”^①

因此，若说是表示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那么反战斗争客观上本应旨在捍卫每一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而支持战争则助长了资产阶级反工人、反民主意图的实现。

因而，那些保卫祖国的词藻事实上掩盖了捍卫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社会沙文主义领袖们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无情揭露这一事实的并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激昂的论战，而是客观事实。

在取得机会主义工人首领们对战争的支持的同时，资产阶级就考虑利用这种支持来削弱工人运动，分裂工人运动的队伍，积极开展反对革命派别的斗争。

统治集团使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面对一种抉择：或是支持战争，或是遭到严厉的镇压，这事实上迫使社会民主党走向公开的分裂。从战争爆发时起，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行动就绝没有得到过整个工人阶级的支持。结果，在每个国家里，工人运动通常被分裂成三大派别。右翼社会民主党首领F·艾伯特、P·谢德曼（德国）、J·盖得、M·桑巴（法国）、K·伦纳（奥地利）、E·王德威尔得（比利时）、G·盖恩德曼（英国）等人宣称在战争中无条件地支持“自己的”政府。在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社会民主党的首领参加了政府。

中派首领K·考茨基、H·哈阿兹（德国）、J·龙格（法国）、F·阿德勒（奥地利）、J·麦克唐纳（英国）等人口头上谴责战争，实践中却以不适宜为借口阴谋破坏工人的反

^①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献》（第41卷）1915年版第294页。